

# 文史知識

12

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傅璇琮

乐府和乐府诗

王运熙

怎样学习古文 (一)立体的懂

周振甫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与礼乐文明

杨向奎

北京大学一九八六年研究生入学历史试题

《群婴斗草图》与古代斗草风俗

畏冬

1986



WENSHI ZHISHI





医药学院610 2 01472095

# 文史知识

1986年第12期

(总第66期)

• 治学之道 • 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傅璇琮 3

• 文学史百题 • 乐府和乐府诗 王运熙 10

• 历史百题 • 励精图治的雍正朝 张显传 16

• 怎样读 • 概述清代学术的力作  
——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瞿林东 23

|                  |                                             |     |    |
|------------------|---------------------------------------------|-----|----|
| 诗<br>文<br>欣<br>赏 | 轻轻二句遂为千古绝唱——荆轲《易水歌》赏析                       | 林庚  | 29 |
|                  | 咏物而不滞于物——说欧阳修《望江南》                          | 吴翠芬 | 31 |
|                  | 云帆月影画意浓——卢挚〔沉醉东风〕《秋景》赏析                     | 洪柏昭 | 34 |
|                  | 性格，在运动中显示出多种情态<br>——读《聊斋志异·小谢秋容》（附《小谢秋容》全文） | 何永康 | 37 |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与礼乐文明 杨向奎 44

从“虚静”说到“出入”说——古代文论对创作心境的辩证认识 路侃 49

• 怎样学习古文 • (一) 立体的懂 周振甫 54

|               |                      |     |    |
|---------------|----------------------|-----|----|
| 文化<br>史<br>知识 | 先秦时期的兽角象征            | 李炳海 | 59 |
|               | 花开时节动京城——漫谈中华民族的赏花传统 | 周沙尘 | 62 |
|               | 满族的婚姻习俗              | 岑大利 | 68 |

•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连载三十二) •

元代职官(一) 蒙古官制 周清澍 72

• 俗语佛源② • 野狐禅 醍醐灌顶 婆心

当头棒喝 实际

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 77

中国目录学之祖——《别录》和《七略》

苑 琪 79

人物春秋

燕国的军事家政治家乐毅

杨 钊 81

汉初谋臣陈平

许天柏 86

“读书种子”方孝孺

王世华 92

诗应缘情而言志

王 前 98

成语典故

敝帚千金

丛 铮 104

死诸葛走生仲达

卓太栾 105

• 书画欣赏 • 《群婴斗草图》与古代斗草风俗

畏 冬 106

• 文史研究动态 • 1. 关于《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的讨论

110

2. 近年来对元稹白居易的评价问题讨论综述

陈书录 胡腊英 113

• 文史信箱 • “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王学太 115

北京大学1986年研究生入学历史试题

秦汉史 (22) 魏晋南北朝史 (48) 宋史 (58) 元史 (109)

明史 (91) 清史 (103) 中国近代史 (119)

《文史知识》1986年总目

120

群婴斗草图(封二)

《孔圣讲学图》(封三)



## 关于唐代文学研究 的一些想法

傅璇琮



傅璇琮，1932年11月生于浙江宁波。现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研究唐宋文学。编著有《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以及其他若干单篇论文等。

近十年来，我在编辑工作之余，集中时间研究唐代文学，除了发表一些单篇论文之外，作为专书出版的，有《唐代诗人丛考》（1980，中华书局）、《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与张忱石、许逸民合编，1982，中华书局）、《李德裕年谱》（1984，齐鲁书社）、《唐代科举与文学》（1986，陕西人民出版社），另外在排印中的有《唐才子传校笺》，则是由我担任主编，邀约有关的研究者共同撰写。我个人的成绩是很微小的，而近六、七年来，我国整个唐代文学的研究获得迅速的发展。这些方面的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填补了不少空白，尤其是注意到了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加以综合的考虑和概括，力图从中探求文学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是研究水平提高的明显的标志。如初唐文学，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反六朝余风斗争，大历时期文学（以及与之相应的南北文风的异同），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革新，古文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晚唐文学，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



第二，对作家作品的考订更加细密。过去的唐代文学研究，着力于欣赏、评论，材料掌握不足，因此难免有些论断建立在不确切或错误的材料基础上。这些年来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对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订，对作品写作年代、真伪存佚的辨析，比起别的朝代来，似更为细致精确。它表明了我们不少研究者在踏踏实实地做工作，努力使我们的理论研究基础更加扎实牢靠。

第三，开拓了研究领域。这些年来发展了不少与唐代文学关系密切的边缘科学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者注意到文学与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有些论著以文学为中心而扩展到对佛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科举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的研究，扩大了学术领地，也深化了对文学特征的认识。

第四，对文学艺术性分析的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词句赏析的范围，而是从整体的审美要求出发，对思想和艺术作统一的探讨，并且注意到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与外国文学的比较，拓展了研究的领域。

我觉得，以上四点基本上可以概括这些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还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这些年来涌现出了一批二十几岁到四十来岁的中青年研究者，上面所说的四个方面的成就，有不少即是他们作出的，他们是我们研究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建国以来还没有哪个时期象近年那样集中出现那么多作出成就的人才。他们富有朝气而又脚踏实地，立论新颖而又基础扎实，有进取心而又对前辈学者的成就十分尊重。他们近年来所发表的论著，有的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他们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骨干，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我认为，完全可以预期，依靠老一辈学者和大批中青年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在今后几年内，唐代文学研究必将有一个大的进展，有新的突破。

那末，我们应当怎样继续前进呢？应当怎样来跨出新的的一步呢？这里，我想根据当前的研究现状，参照自己的治学体会，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建立文学编年史的研究，二是加强作家传记的研究，三是大力开展对专书、专题的研究。

我在《唐代诗人丛考》的《前言》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

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对于叙述复杂情况的文学发展，似乎也有很大的局限。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象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评论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点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坛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顿，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

这篇前言是1978年写的，但上面所说的想法，却产生于六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我因病住院，随身携带一本新出版的丹纳《艺术哲学》的傅雷译本在病床上阅读。当时“左”的思想对学术活动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但说来很奇怪，丹纳的书却对不少知识分子有吸引力，使他们感到新鲜。我也从《艺术哲学》中得到很大启发，觉得研究文学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这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样做，就将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改变。但具体如何着手呢？我当时想到了编年史。我觉得文学编年史将会较好地解决研究整体的问题。这也是对于那一时期文学史著作的体例所感到的一种不足。现在我认为，文学史著作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任务，它不能完全为文学编年史所代替，两者可以并存，而当前的情况下，建立编年史的研究尤应引起特别的注意，它确实有不少的优点。我的这一想法也是受我国当代文学蓬勃发展的现实所启发。我们写当代文学史，如果还是象老样子，一个作家写完了再写另一个作家，一个个排着队来写，肯定会把丰富多采、生机勃勃的当代文学弄得死气沉沉，使人感受不到蕴含于作品中的那种强烈的时代精神和当代意识。如果我们逐年地作综合的研究，把政治发展、经济改革、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作家们复杂多样的经历及其创作的活跃，作总体的考察，就会清晰地看出新时期文学在这十年中前进的

步伐。唐代文学也是如此，初唐将近一百年，虽有进展，但较缓慢，盛唐三四十年，突然象火山爆发那样发出那么多诗的熔岩，而盛唐的高潮以后，又有一个回顾、思索的曲折时期，然后又产生贞元、元和时以古文运动和韩、白两大诗派为标志的另一高潮，这些，如果有一详确得当的编年史，那末唐代文学的快慢起伏，就会看得很清楚。近年已经出版了陆侃如先生的旧著《中古文学系年》，虽然还有可以改进之处，但毕竟给研究者提供一种思索上的选择。我们如果分段进行唐代文学的编年，把唐朝廷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材料，一年一年编排，就会看到文学上的“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这也必将引出现在还找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第二点，关于加强对作家传记的研究。这也是我自己切身体会而得的。如上所述，六十年代前期，我产生了文学编年史的想法，因此中断了我当时进行的宋代文学资料的探讨（在这之前我已编了“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和《杨万里范成大卷》两书），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充分发展的时代唐朝来作一番试验，于是就拟订了一个计划，从初唐开始，看了一些史书和唐人别集。当然，过不了多久，“文革”事起，这些都谈不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又有机会重操旧业，故志未改，又继续做编年的工作。但做了一阵子，在深入一步以后，我发觉，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作家评论，文章和专书也已不少，但细究起来，众多作家的生平却仍然若明若暗，有些事迹叙述不确切，有些则基本上搞错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精确的编年工作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有作家事迹研究的基础，才能再加概括和综合，编年史也才有符合历史实际的内容。这就使我从编年中回过头来做作家考证的工作，而又因为有编年的基础，事迹的考辨更能收到相互参照的效果。《唐代诗人丛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这些年来，作家事迹的考证工作已经做得很不少了，但就以整个唐代文学而言，似还差得很远。我粗略估计，这些年来经过考辨，大



致可以搞清其生平事迹的，约占整个有成就作家的十分之三、四，进一步要做的工作还不少。如果对还占十分之六、七的作家的情况不甚清楚，就很难说我们已经理清了唐诗发展的脉络。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无论理论阐发和资料考证，要考虑到作家群。我们过去对作家群的观念是较为淡薄的，视角只落在少数几个大家身上，于是文学史往往形成孤立的点的联缀，而不是永流不歇的作家群体的发展。我们可以闭目想一想，历史上哪一个伟大的、杰出的作家周围没有好几个较为不大杰出的或次要的作家呢？他们有的是好朋友，在创作上互相切磋和支持，有些又可能是对立面，在思想和艺术上又常有诘难或竞争。大作家往往受到小作家的影响。时代特色有时在一些小作家的作品中更能得到体现。研究大家与小家的关系，研究他们怎么共同承受社会的影响而又如何各异地表现出时代的音响和色采，这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多少吸引人的新鲜题材。

《唐代诗人丛考》考证了初唐至大历时期大小作家二十余人，那末中唐以后怎么办？仍如《丛考》那样一个个考下去呢，还是用一条线索把一些作家的事迹串联起来呢？从对史料的考察中，我发现中晚唐之际不少作家与牛李党争有关，而牛李党争又头绪纷繁，不但是非曲直众说纷纭，而且材料的真伪纠葛往往使人不知所从。有些搞唐代文学的人，一碰到有些作家夹杂在那时的党争中，也感到头痛，于是或者沿袭旧说，或者采取回避态度。显然，要使中晚唐作家研究前进一步，光靠单个作家的考证是不够的。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办法则是研究李德裕。李德裕是牛李党争的核心人物。于是着手编写《李德裕年谱》。正是从李德裕的政治措施对当时影响的研究中，我弄清了李商隐的政治态度，清除了过去对他的一些误解，也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了杜牧、元稹、白居易、李绅等人的社会政治活动。我觉得《李德裕年谱》一个小小成功之点，就是通过对牛李党争的澄清通盘考察了与此有关的作家的事迹，把作家的经历与当时政局的重大变动作了幅度较大的探索。

由此我想到，我们是否可以组织一套中国古典作家传记丛书，凡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过贡献，有其特色的作家，从屈原开始，到清末，分别写出传记。这套传记丛书，要立足于信实，要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又经过撰写者的独立研究，对作家的生平事迹写得清清楚楚，不回避矛盾，也不强作解人，从材料出发，而这些材料又是经过核验的。无论今后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评价有何等样的变化，要做到这套丛书所写的基本事实是推翻不掉的，而无论评价是如何的花样翻新，它们对这些作家的生平必须以这套传记丛书为依据。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不是不可达到的，而如果我们真的做成了，则将是一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工程，在世界上也会产生影响。我们如果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一套作家传记，同时还编有从先秦到近代的多卷文学编年史，我们有了这二者，那不但唐代，而且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就有了雄厚的基础，尽可以在这上面做出宏文巨著来了。

唐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要做的第三点，是大力展开对专书、专题的研究。加强对专题的研究，是容易理解的，这几年也作出引人注目的成就。譬如有些研究者，把佛教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并以之与文学作比较的研究。这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有陈允吉同志论王维、韩愈、李贺、白居易作品与佛教文化关系的一系列论文，有孙昌武同志的《唐代文学与佛教》的专著。罗宗强同志从文学思想的演变、文学思潮的发展着眼，写出了极有深度的论著，开拓了史的研究的新领域。我个人则希望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窥探唐代士人的生活道路和心理状态，它们又怎样给予创作以影响。专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拓，如唐代盛行的道教与文人是怎样一种关系；西域的文化怎样吸引文人的注意，使他们的作品带上特异的光芒和色泽；文人怎样在幕府中生活，他们的从军生涯又与边塞诗发生什么样的联系；唐代不同地区、不同的地理风貌，与作家群有什么关系（附带说一句，我们在文化史的研究中，对历史地理或地理文化，注意是很不够的，实际上地理及地理学给予其他人文学科的影响不可忽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哈·默金德写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两篇论文，总共不过二、三万字，却引起轰动，八十年代初，一个美国人把它与达尔文《物种起源》、马尔萨斯《人口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等十五种书并

列，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sup>①</sup>）。敦煌文学的研究，已蔚为大国，就不再论列。

比较起来，专书研究不大受人注意，其意义似乎也不大为人理解。我觉得，这是我们深层研究所必需做的一着。清人在唐人别集的笺注上做出了成绩，其中的一些好的注本，如陈熙晋的《骆临海集笺注》，蒋清翊的《王子安集校注》，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王琦的《李太白集校注》，钱谦益、仇兆鳌、杨伦等的杜诗注，以及王琦等的李贺诗注，冯浩的李商隐诗注，曾宪的温庭筠诗注，不但有助于对原作词句的理解，而且也使后人对唐人诗文中涉及的典章制度、人事交往、风俗习尚能有较多方面的认识。唐代文献中，不仅是作家集子，有些综合性的书籍，更需要研究阐释。如北宋初年人王谠的《唐语林》，多方面记录唐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学情况，但现存多有残缺，现在周勋初同志一一为之找出材料出处，间加注释，为专书研究作出新的努力。又如集中记载唐代科举活动的《唐摭言》，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书，过去岑仲勉先生做过一番研究，现在还可进一步整理。《文镜秘府论》，已经有了王利器先生的详尽的注本，日人的另一本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也是很值得做的，其意义恐不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之下。我自己近年来邀约国内的有关研究者，从事于《唐才子传》的笺证，已完成全书的一半，正在排印中。专书的研究，实际上是对研究者工力的一种考验，也是我们整个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支撑。如果我们对唐代若干有代表性的专书分别作了专题性研究，这就会使我们的整个研究基础较前更为充实，也会使年轻的研究者得到严谨学风的熏陶。

当前，古典文学研究如何革新，如何突破，是研究者和读者所十分关心的，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也在热烈地进行。这对于活跃思想、开阔视野，很有好处。我觉得，我们应当关心和欢迎这一讨论，而与此同时，具体的研究仍需积极进行，我们要做基础工作。本文所谈的，就是这样的基础工作，它们可能不易为人瞩目，不易一时见效，但却是一种切实有用之事，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

---

① 见商务印书馆1985年10月出版的《历史地理枢纽》一书及译者前言。



# 乐府和乐府诗

王运熙

在中国中古时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央政府一直设置着管理音乐和歌曲的专门官署乐府，负责采集和编制各种乐曲，配诗演唱。这些配乐演唱的诗歌，就称为乐府诗，也简称乐府。乐府原指音乐官署，后来也用以称乐府诗。现存乐府诗数量众多，其中有不少采录民间歌谣，更多的是文人作品，两方面都有不少优秀作品。大量的文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歌的影响。乐府诗原是配合音乐的，但后来许多文人作品，只是用乐府体写作，并不配乐。唐代的新乐府辞更是如此。

秦代已有乐府官，但史籍没有具体记载，也没有诗歌流传下来。西汉以来，关于乐府的记载就具体了。西汉乐府官署有两个：一为奉常卿（即太常卿）统属的太乐，掌管雅乐，主要是传自周代的乐章；另一为少府卿统属的乐府，是汉武帝时建立起来的，专管通俗音乐，着重从各地采集民间歌曲，供帝皇和贵族们娱乐欣赏之用。汉武帝设立乐府，采集各地风谣，这一制度被以后历朝所承袭，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它使许多优秀民歌赖以保存和流传，为古代诗歌输送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我国诗歌的繁荣和发展。东汉乐官承袭西汉，不过太乐令改称为大予乐令，乐府令改称为承华令。两汉演唱通俗乐曲的音乐人员，叫黄门鼓吹乐人。到曹魏时代，由于清商曲的发展，于太乐、鼓吹（性质相当西汉的乐府）两署外，又增设了清商署，西晋沿袭其制。六朝时代官制简化，东晋、宋、齐，仅设太乐署，统管雅乐、俗乐，至梁、陈于太乐外又增设鼓吹署。北魏、北齐，大致也设太乐、鼓吹两署。北周恢复古制，依照《周礼》建立官制，设立大司乐、小司乐等官。隋代设有太乐、鼓吹、

清商三署，到唐代省去清商署，把它并入鼓吹署。汉魏六朝的通俗音乐叫清商乐或清乐，其歌辞为相和歌辞、清商曲辞，里面包含了许多优秀的民歌或文人作品。从曹魏到隋代，中央朝廷有时设立清商专署，有时由太乐或鼓吹署兼管清商乐，总之，清商乐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是很重要的。到唐代，新兴的民间歌曲和西域音乐相结合，产生了新的音乐燕乐。配合燕乐的歌辞，逐步发展为长短句（词）。燕乐兴起，清商乐衰落，从此，中国的音乐和音乐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共一百卷，搜集汉魏六朝隋唐五代的乐府诗最称详备。该书把乐府诗分为十二大类，下面按照其原来次序，分别作一点简括的介绍：

一、郊庙歌辞 是朝廷祭祀用的乐章。古代帝皇立郊祭祭天地，于宗庙祭祖宗，郊庙歌辞便是郊祭、庙祭时歌颂天地、祖宗的乐章。汉代有《郊祀歌》十九首用于郊祭，《安世房中歌》十七首用于歌颂祖宗。这类郊庙乐章，以后历朝不绝，现存数量颇多；《乐府诗集》存诗十二卷。

二、燕射歌辞 是帝皇用于宴会和大射（射箭的一种仪式）的歌辞。帝皇宴飨宗族、亲友、宾客和大射时，要奏乐曲，这是从周代传袭下来的制度。今存西晋至隋代歌辞。《乐府诗集》存诗三卷。

三、鼓吹曲辞 鼓吹曲原是军乐。其乐器主要有鼓、箫和笛，鼓吹就是击鼓吹箫笛的意思。汉代，鼓吹曲还用于朝廷节日大会和帝皇出行道路等场合，借军乐以壮声威。汉鼓吹曲有《短箫铙歌》十八首，其中也有少数民歌，后代依汉《铙歌》旧题作诗者不绝。曹魏、孙吴以下各朝，亦各制鼓吹曲，其内容多数铺叙帝皇的武功。《乐府诗集》存诗五卷。

四、横吹曲辞 从北方少数民族传来的军乐，其乐器有鼓、角，故后来又叫鼓角横吹曲。汉魏以来，流传的有《陇头》、《关山月》等十八曲，今所存歌辞，均为南朝和唐代文人作品。又有《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多首，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辞。《乐府诗集》存诗五卷。

五、相和歌辞 原是汉代的民间歌曲，包含不少民歌，后来产生了大量受民歌影响的文人作品。相和，取丝竹相和之义，即用弦乐

器、管乐器配合歌唱，声调清婉动听，因此受到社会各阶层的爱好。相和歌中的平调、清调、瑟调三部类，称清商三调，曹魏开始特别发展，成为相和歌的主要部分。《乐府诗集》存诗十八卷。

六、清商曲辞 以清商三调为主的相和歌，实际也是清商曲。东晋南朝时代，利用发展汉魏清商旧曲，配合南方的民间歌曲和文人拟作，是为清商新声，《乐府诗集》称为清商曲辞，存诗八卷。

七、舞曲歌辞 配合舞蹈演唱的歌辞。分雅舞歌辞、杂舞歌辞两种。雅舞歌用于郊庙朝会，性质与郊庙、鼓吹曲辞相仿；杂舞歌用于朝会、宴会，性质与相和歌接近。《乐府诗集》存诗五卷。

八、琴曲歌辞 用琴演奏歌曲的歌辞。琴曲起源很早，但现存歌辞，大抵都是南朝、唐代文人作品。其中唐尧、虞舜、周文王以至汉代王嫱、蔡琰等人的作品，都出自后人假托。《乐府诗集》存诗四卷。

九、杂曲歌辞 这类歌辞所收曲调，在唐宋时代配乐情况已不清楚，有的只是文人案头之作，根本没有配乐。因其数量甚多，内容复杂，故称为杂曲歌辞。察其风格，多数与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相近。《乐府诗集》存诗十八卷。

十、近代曲辞 隋唐时代配合新兴的燕乐演唱的歌辞。郭茂倩在宋代编《乐府诗集》，于隋唐年代为近，故称为近代曲辞。这类曲辞，是唐五代词的先驱者。《乐府诗集》存诗四卷。

十一、杂歌谣辞 是不配合音乐的歌谣。因其风格与乐府所采民歌接近，故附列为一类。其中远古时代的作品，也多出后代假托。《乐府诗集》存诗七卷。

十二、新乐府辞 唐代诗人学习汉魏六朝乐府诗（主要是相和、清商、杂曲三类），采用其体式，但题目、题材，都出自创造，形成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辞。这类歌辞都不配乐，是文人案头之作。《乐府诗集》存诗十一卷。

以上十二类歌辞中，最有价值的是相和歌辞、清商曲辞两类，它们包含了许多优秀民歌和大量文人受民歌影响的好作品。鼓吹曲辞、横吹曲辞、杂曲歌辞三类中，也有少量优秀民歌和不少文人佳作。新乐府辞都出自唐代文人之手，也有不少深刻反映现实的佳作。郊庙歌



辞、燕射歌辞两类，内容大抵为帝皇歌功颂德、祈求福祐和祝颂、规勉之词，是纯粹的贵族乐章，缺少文学价值。舞曲歌辞、琴曲歌辞两类，篇章较少，内容亦较平庸。近代曲辞配合燕乐，实际属于词的范围，因此一般谈乐府诗的都不予论述。杂歌谣辞不配乐，也不采用乐府体制，实际也不是乐府诗。汉魏六朝的优秀入乐民歌和在不同程度上受民歌影响的历代文人佳篇，构成了乐府诗的主流。

统观乐府诗的发展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汉魏西晋、东晋南北朝、唐代三个阶段。下面分别作一点简略介绍。

在相和、杂曲、鼓吹曲辞中，包含着汉代的五六十首无名氏作品，后世称为“古辞”。其中一部分是民歌，所谓“汉世街陌谣讴”（《宋书·乐志》），也有一些是文人作品。不少“古辞”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下层人民的痛苦，“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如《战城南》、《陌上桑》、《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艳歌行》、《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在描写上多用叙事体，语言朴素生动。句式有的是杂言，有的则为五言，是五言诗体的先驱者。《焦仲卿妻》（即《孔雀东南飞》）描写男女爱情悲剧，控诉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更是一篇中国诗歌史上罕见的长篇叙事杰作。汉乐府民歌的深刻内容和生动新颖的艺术形式，为中国古代诗歌创立了一个新的优良传统，从而对后代诗歌产生深远的影响。

曹魏文人在汉乐府古辞影响下，写了不少乐府诗，有不少佳篇。曹操的《薤露》、《蒿里》、《苦寒行》，王粲的《七哀》等长于叙述汉末丧乱。曹丕的《燕歌行》写思妇怀念远游他乡的夫君，情辞凄婉，是现存早期完整的七言诗（东汉张衡《四愁诗》句中还多夹虚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与王粲《七哀》（其一）等都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这些诗篇大多注意反映社会情况和人民生活，多用五言体，见出作家努力学习汉乐府民歌的成绩。曹植的乐府诗篇数量颇多，除承袭汉乐府民歌风味外，有一部分注意对偶的工整和辞藻的华美，为以后文人所重视和学习。西晋乐府诗主要作家，有陆机、傅玄、张华等人。其作品或反映现实，或叙述故事，体制大致沿袭汉魏。但以陆机为代表的该时期作家，着重模拟

前代作品，因袭多而创新少，语言又多注意对偶辞藻，缺少朴素生动之美，因此总的成就不及曹魏。以后南朝文人用汉魏乐府旧题写的诗篇，大多数也存在这种缺点。

汉魏西晋的乐府诗，如上所述，以相和、杂曲、鼓吹曲中的民歌，曹魏西晋的一部分文人佳篇，为最有文学价值。此外，汉代鼓吹曲辞《短箫铙歌》中的大部分，汉郊庙歌辞《郊祀歌》、《安世房中歌》，虽然文学价值不高，但因都是这些类别乐府诗的首出者，在体制上有创新意义，因而受到某些研究者的注意。

东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时代，南北方各自有其乐府诗。南方以清商曲辞为主，其中以吴声歌曲、西曲歌两部分最为重要。吴声歌曲曲调有《子夜歌》、《华山畿》等二十多种，歌辞有三百多首。西曲歌曲调有《石城乐》、《乌夜啼》等三十多种，歌辞有一百多首。其曲调和歌辞有的出自民间；有的则出自贵族文人之手，但也富有民歌风味。其歌辞内容，绝大部分是抒写男女情爱，感情热烈而又缠绵，但显得狭窄单调。形式大抵为五言五句（但不调平仄），语言清新自然。这些歌辞对南朝文人的抒情小诗和唐代的五言绝句产生明显影响。南朝文人除写了不少清商曲辞外，还写了许多相和歌辞、杂曲歌辞。谢灵运、鲍照、沈约、吴均等著名作家都有不少乐府篇章，其中鲍照的成就尤为杰出。他在民歌基础上创作的七言乐府《拟行路难》十八首，不但内容较为广阔深入，而且变过去七言诗句句用韵为隔句用韵，语言流畅奔放，对后来七言歌行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横吹曲辞的鼓角横吹曲中，保存着北方的民歌二十多曲，六十多首。其曲调有《企喻歌》、《陇头流水歌辞》、《折杨柳歌辞》等。因其曾被南朝梁代乐府所采用，故称“梁鼓角横吹曲”。它们多数是北方鲜卑族的民歌，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珍视的兄弟民族的文学遗产。其内容比较广泛，涉及战争、行役、婚姻、爱情、人民贫苦生活等各个方面。体式也很短小，多数为每首四句。它们表情慷慨豪爽，语言刚健直率，风格与南方的吴声、西曲迥然不同。《木兰诗》是鼓角横吹曲中的唯一长篇，它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艺术性也很强，因此为后代广大读者所喜爱。它可与汉乐府《焦仲卿妻》比美，被称为南北两

大民歌。

唐代配乐的近代曲辞，属于词史范围，这里不论。唐代的乐府诗除郊庙歌辞外，都不合乐，是文人案头创作。它们可区分为两大类。一是古题乐府，根据鼓吹、相和、清商、杂曲等旧的曲调体式进行写作。这类作品数量颇多，其中一部分能冲破旧曲的题材限制，自出机杼，艺术上也富有创新意味，因而达到很高水平，成绩远远超过南朝许多文人的乐府古题。象高适的《燕歌行》，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杜甫的《前出塞》、《后出塞》，李贺的《雁门太守行》等，都是明显的例子。另一大类便是新乐府，是根据内容自制新题的歌辞。这类歌辞唐初已有，到盛唐多起来，象王维的《桃源行》，李白的《横江词》，写得都很好。到杜甫继承汉乐府民歌和建安文人乐府注意反映社会现实的传统，写了《悲陈陶》、《兵车行》等篇，更为新乐府创作开辟了一条大道。以后元结、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以至唐末皮日休等都纷纷写作，为唐代诗坛的重要现象，有的文学史研究者把它称为新乐府运动。其中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达到了这类作品的高峰。唐代的新乐府辞，其内容体式也是相当广泛复杂的，但这类着重反映弊政民瘼、立意在讽谕的新乐府，确是新乐府辞中最光辉的部分。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写作乐府诗者不绝。其体制和唐人相仿，大致是古题乐府、新乐府两大类，都不合乐。其中也不乏佳作，但总的说来，缺少创新意味，艺术成就也逊于唐人，这里不再介绍了。唐代以来配合燕乐的歌辞为词、曲（散曲）。词、曲有时也称乐府，如苏轼的词叫《东坡乐府》，马致远的散曲叫《东篱乐府》，其涵义与乐府诗不同，这是应当注意辨别的。

在中国文学史中，一些新起的民间文学，由于具有真挚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活泼生动的艺术形式，虎虎有生气，因而对文人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两汉南北朝时代的乐府民歌，为中国中古诗坛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哺育了建安以后世世代代的诗人。这种重要历史现象，便是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作用的一个明证。



## 励精图治的雍正朝

张显传

有清一代的政绩以康熙元年至乾隆六十年，即 1662 年——1795 年最为可观，这个时期是清王朝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康熙、乾隆两朝所占时间太长，因而使人们忽略了夹在这两者之间雍正朝的业绩；也由于一些荒诞不经的传闻，扭曲了雍正皇帝的形象。事实证明，雍正帝是个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康熙盛世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整顿，革除了康熙末年遗留下来的一些弊病，使清朝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上都有所发展，从而为乾隆的极盛奠定基础。反过来说，要不是雍正帝的整饬，康熙末年的矛盾会愈演愈烈，清朝的统治会早转衰败。

那末，康熙末年有哪些弊端？雍正帝做了哪些整顿工作呢？

雍正 是康熙的第四子，原名爱新觉罗·胤禛，生于 1678 年（康熙十七年），死于 1735 年。1709 年被封为雍亲王，1722 年（康熙六十一年）继位，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代皇帝，历史上称其为清世宗。

康熙末年，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不断，官僚、宗室结党营私，赋役混乱，贪污横行，吏治废弛，各地州县“虚名冒饷，侵渔扣克”现象司空见惯，隐匿土地、亏空钱粮的情景非常普遍。而康熙帝“圣心宽大慈祥，未曾将侵蚀国帑、贪取民财之人置之重典。”（《清世宗实录》卷 91，雍正八年正月丙辰）致使地方官吏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康熙帝无力解决这些弊端，因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自康熙五十年江西发生暴动开始，各地农民起义屡有发生，到康熙六十年，朱一贵领导台湾数万人民起义，称帝，达到高峰。雍正帝就是受命于种种弊政缠绵不绝之时。